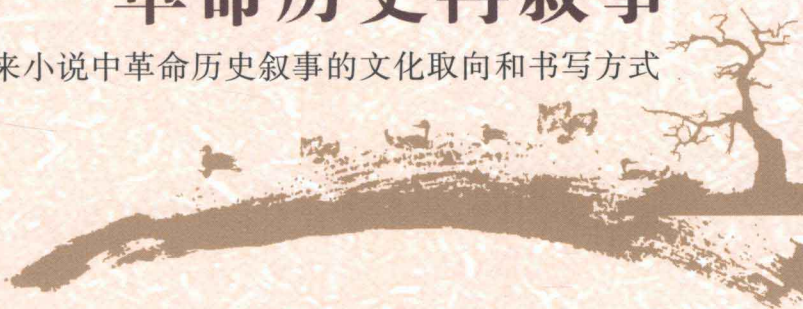


孙斐娟 著

后革命氛围中的 革命历史再叙事

——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革命历史叙事的文化取向和书写方式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史叙事的文化取向和书写方式”（项目批准号：
该基金项目资助。本书获得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号：j0200530708）支持

孙斐娟 著

后革命氛围中的 革命历史再叙事

——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革命历史叙事的文化取向和书写方式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再叙事:1990 年代以来小说中革命历史叙事的文化取向和书写方式/孙斐娟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3

ISBN 978 - 7 - 216 - 07500 - 8

I. 后…

II. 孙…

III. 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7838 号

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再叙事

——1990 年代以来小说中革命历史叙事

孙斐娟 著

的文化取向和书写方式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印张:16.25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页:2

版次: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8 千字

定价:38.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7500 - 8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内 容 摘 要

本书以 1990 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为研究对象，以经典革命历史文本为参照，借助于文本细读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着重分析“后革命氛围”中革命历史再叙事文本的文化取向和书写方式，整体透视中国当代文学中革命历史叙事的发展脉络，并由此为文学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线索。

本书由“绪论”、“续写”、“补写”、“改写”、“戏写”和“结语”六个部分构成，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首先提出研究的问题，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其次，说明论文的考察方法和论文框架；最后对论文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如后革命氛围、革命历史叙事与革命历史再叙事分别加以界定和阐释，奠定立论的根基。“后革命氛围”是本论文一个支撑性的核心概念范畴，用它来描述革命结束后，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其可取之处。在“后革命氛围”中，革命历史叙事更加鲜明地呈现出多样的景观，是在不同精神层面上展开的对经典革命历史文本的重写，众语喧哗较难分清主次。但我们大致可以从不同文本中归纳出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取向和书写方式，即续写、补写、改写和戏写。论文试图打破不同时期革命历史叙事的时间界限，主要依据这四种

方式横向展开讨论，把论述重点落脚在当下的革命历史叙事对既往的吸纳和改造上，以显现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多重特征和丰富内涵。

第一章主要探讨续写产生的原因和相应的文本特征。1990年代以来某些表现革命历史的作品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对革命意义和价值的重新倡导，延续了经典革命历史叙事的精神表达。虽然它们作为革命历史经典文本的续写文本而出现，但并不是对革命话语的原版复制，而是受现实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在《我是太阳》、《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小说中，阶级对立的观念被淡化，英雄人物的刻画也变得灵活多样，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在作品中呈现出某些世俗化和大众化的特征，已明显打破了既往革命历史书写的政治纯粹性。这些作品的出现很大一部分缘于作家对现实的失望，他们转而在历史中寻找慰藉，正好应合了革命后的庸常年代中大众的怀旧心理，并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作出了证明。

第二章集中分析补写产生的原因和相应的文本特征。补写是一种重构革命历史的折中方式。它无意于简单肯定或者否定革命的意义，而是寻求平等民主的交流平台，鼓励不同思想的对话，消除历史的疑惑。作家在对历史的重审中补充叙述了对经典革命历史叙事有意或无意省略的地方，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既往单纯表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抗日扩展成全民抗日，并在一定限度内重新评价了国民党的抗日行为，更为强调民族精神而相应淡化了阶级立场；二是正视人道主义精神与革命的关系，认识到人性和

革命共有的美好之处，并对革命进行了一些反思。另外，作家还结合中西方的文化思想对革命的目的和意义作了一些新的诠释。论文主要以《遍地鬼子》、《五月乡战》、《圣天门口》、《人面桃花》等小说为例来阐释补写的种种表现形态。

第三章重点论述改写产生的原因和相应的文本特征。改写对经典革命历史叙事采取了一种断然否定的态度。它以颠覆的方式激烈地反抗过去“虚假”意识形态的欺瞒和愚化，与经典革命历史叙事形成一种反证的写作关系。在莫言、刘震云、苏童等作家的笔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革命不再是农民革命意识觉醒后积极主动参与的结果，而是乡村群氓卑琐的欲望和非理性因素搅动的产物，阶级压迫被排除在乡村自在自为的社会文化秩序之外。而且，那些积极投身革命的个体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反而与革命的价值理念显得格格不入，他们受到排挤、打击和扼杀，要么沦为革命的多余人，要么遭遇死亡的悲剧命运。铁凝、项小米等一些女作家则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指出，女性在革命历史当中承受的是革命权力和男性霸权的双重压迫，进一步瓦解了革命预设的美好图景。

第四章着重考察戏写产生的原因和相应的文本特征。戏写是作家为了迎合大众的消费心理和追逐市场利益，对经典革命历史叙事进行有意的曲解或者趣味化的编排。娱乐是作家书写革命历史的根本目的，游戏则是其基本的写作心态。娱乐的方式则多种多样：要么是戏仿经典革命历史文本，添加新的时代内容将其变得好笑好玩；要么是编织英雄人物的风流情史，涂上欲望的色彩，满足人们的感官欲望；要么是

将革命故事写得惊险刺激，曲折离奇，增加各种思想上的亮点，吸引人们的眼球。诸如此类的方式不一而足，手段策略有高有低，但相同之处都是作家对革命历史的消费性利用和娱乐性表现。他们通过帮助大众获得种种快感体验，从而在文化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本书主要以《红色娘子军》、《沙家浜》、《暗算》、《潜伏》等小说为个案分析戏写的种种叙述策略。

结语部分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重新审视革命，进一步思考后革命氛围中革命历史叙事存在的价值和问题，指出大众文化对革命历史叙事的影响，并对革命历史叙事的走向提出个人的见解。

目 录

绪论	1
一、问题缘起、研究现状与本书思路	1
1. 问题缘起	1
2. 研究现状与本书思路	5
二、革命话语的演变与“后革命氛围”释义	10
1. 革命话语的时代变迁	10
2. 何谓“后革命”与“后革命氛围”	18
三、革命历史叙事与革命历史再叙事	27
1. 经典革命历史叙事的建构	27
2. 革命历史再叙事的文化取向与书写方式	31
 第一章 续写：文化怀旧中的英雄归来与神话再造	41
一、怀旧中的续写：革命精神的深情拓摹	42
1. 政治延续与合法性证明	42
2. 大众怀旧与精神救赎	50
二、英雄主义情怀的回归	58
1. 英雄的复出与改装	58
2. 暴力美学与身体诠释	65
三、理想家庭秩序的再建	73

1. 皈依父亲	74
2. 夫唱妇随	83
第二章 补写：历史疑惑中的思想偏转与话语突围	90
一、疑惑中的补写：革命内涵的平缓位移	90
二、聚焦抗日：民族主义话语的出场	96
1. 民族情感主导下的全民抗日描绘	100
2. 对国民党道德评判的弱化	106
三、反观传统：多元思想文化的对话	112
1. 人道主义对革命道德的穿越	113
2. 民族创世追求与现代革命镜像	123
第三章 改写：批判视域中的理想解构与神圣祛魅	131
一、解构中的改写：革命意义的轰然瓦解	132
1. 裂变思维与重写冲动	132
2. 现实反思与历史批判	139
二、乡村革命的幻象	146
1. 农民革命图景的瓦解	146
2. 乡村文化逻辑的重启	155
三、以个体的名义虚化革命	160
1. 个体价值的追寻与革命魅惑	160
2. 从边缘介入革命历史的性别诉求	169
第四章 戏写：娱乐消费中的狂欢谐谑与传奇重构	179
一、娱乐中的戏写：革命外壳下的快感释放	180
1. 大众文化与快感追求	180
2. 红色资源与消费革命	184

二、革命故事的戏说与笑看	193
1. 革命场景中的狂欢化书写	194
2. 故事新编中的风流余味	201
三、谍战传奇与大众趣味	209
1. 复杂惊险的情节结构	212
2. 推陈出新的叙述方式	219
结语	225
参考文献	232
后记	246

绪 论

一、问题缘起、研究现状与本书思路

1. 问题缘起

2003年第1期《江南》刊登了薛荣的小说《沙家浜》，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在围绕小说《沙家浜》展开的争论中，批评性意见占绝对优势，指责小说“严重践踏了人民的情感，污蔑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①类似的看法是诸多论者否定小说《沙家浜》的基本依据。^②与此同时，2003年2月27日沙家浜镇和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召开了“小说《沙家浜》评议会”^③。沙家浜镇以“常熟市百万沙家浜人民”的名义，要求被告停止侵权、收回刊物、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拥有《芦荡火种》著作权的文牧先生家人表示要保留法律追诉权。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向《江南》杂志社提交

① 萧河：《小说〈沙家浜〉在宣扬什么》，《浙江日报》2003年2月18日。

② 参见张山：《劝君莫骂阿庆嫂》，《中国文化报》2003年2月22日；李庚辰：《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2月24日；一刀：《从胡说到戏说》，《工人日报》2003年2月27日；邵道生：《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2月28日；郝铁川：《小说〈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文汇报》2003年4月2日等文章。

③ 参会者主要是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新四军老战士、研究新四军历史的专家、常熟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的相关领导和该市作家、新闻媒体等。

了抗议书,《沙家浜战士足迹》一书的编辑委员会也给江南杂志社发公开信。^① 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作者薛荣试图站在小说创作允许自由虚构的角度为自己辩护。他承认,小说“对抗日的大背景、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挖掘的不是很深,叙述有些生硬……”,但拒绝接受对小说的政治化批评和以戏说吸引读者眼球的指责。^② 当然,这样的辩解难以平息众怒,让人信服。有关方面也通知薛荣,要他保持沉默。^③ 《江南》第1期停止销售。《江南》主编张晓明做自我批评,向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递交辞呈,请求辞去主编职务,并当面向浙江省作协邀请的新四军老干部递交了检讨书。《江南》第4期刊登《我们就刊发小说〈沙家浜〉的学习与认识》书面道歉信。沙家浜镇镇长和浙江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先后表示接受《江南》的道歉,由小说《沙家浜》引发的纷争到此基本结束。^④

这场纷争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革命历史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遭遇的多重书写问题。革命历史的言说并不能随心所欲,它常常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力量的双向监控。对经典革命历史作品的改写更是如此,仍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禁忌和某些民族文化心理的限制,作者和杂志编辑的道歉是多方压力促成的结果,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在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中依然存在的软性实施策略。针对小说《沙家浜》的种种批评,其中不乏有真诚地维护革命精神的成分,但并非完全出于捍卫革命历史纯洁性的目的,其背后纷繁复杂的利益动机和文化冲突仍需仔细加以辨别。姑且不论,薛荣以人性之名对样板戏《沙家浜》故事的改写是否有炒作之嫌,沙家浜镇等社会团体采取大张旗鼓的声讨行动客观上造成了人们对“沙家

①④ 参见王寅:《“沙家浜”新故事》,《南方周末》2003年7月17日。

② 参见李存照:《小说〈沙家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不满》,《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

③ 参见陈瑜:《〈沙家浜〉之争及其相关的文学问题》,《社会科学报》2003年3月20日。

浜”相关历史地理的关注，这是否在另一层面达到了宣传“沙家浜”的效果？当“革命历史”被当作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时，其丝毫不容侵犯的“神圣性”被祛除，问题的根本分歧就在于以什么样的名义合法开发，而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薛荣单纯把阿庆嫂欲望化，颠倒革命者与“反动派”的黑白人格，迎合了时下解构革命和戏谑历史的风潮，并有效利用了红色经典的文化符号唤起大众的集体记忆，制造了消费时代阅读的震惊效应。小说呈现出粗鄙、低俗的文化趣味，它所遭遇的抵制恰恰又源于作者触动了人们革命记忆的敏感政治神经。新历史小说家固然可以创造新的文本以各种随心所欲的方式消解革命英雄主义，但薛荣对昔日英雄人物的调侃就显得“大逆不道”。这关涉到革命历史在何种条件下该怎么把握叙述的分寸问题。近年来，“红色经典”纷纷被改编成影视剧，但很多改编作品却很难被认可，批评多过赞誉。而且，鉴于“红色经典”改编存在将英雄平民化和世俗化的某些倾向，国家广电总局先后发布三大通知^①，指出改编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和过分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的弊端，正式要求“全国所有电视剧制作机构制作的以‘红色经典’（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经省级审查机构初审后均报送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审查委员会终审，并由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审查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颁发《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尽管这些

^① 即《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调整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电视剧立项及完成片审查办法的通知》、《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对“红色经典”的定义都较为模糊^①，但基本上涵盖了表现革命历史的经典作品。广电总局对“红色经典”改编风潮的整顿再一次显示了国家文化控制的手段和力量。^② 这些现象突出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期革命历史书写问题上多重文化势力和利益诉求机制的复杂交织状态，对其书写方式及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逻辑的深入探讨，是深入理解 1990 年代以来文学发展轨迹和趋向的一个关键性节点。

“文革”的结束意味着激进革命落下帷幕，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不管人们对既往革命历史秉持什么样的情感态度和观照视角，“红色经典”所讲述的革命起源神话和塑造的英雄形象，都成为反思和重述革命历史直接或潜在的参照对象，在远离革命的年代人们以各种方式重新传达着他们对革命的理解和想象。很多作品运用不同的叙事策略对经典革命历史叙事宣扬的革命意识形态，或者加以变通性的扬弃、或者进行修正补充、或者解构颠覆、或者消费嘲弄，在不同程度上瓦解了经典革命历史叙事的思想内涵，但它们又与经典革命历史叙事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因此可以称之为革命历史再叙事。革命历史再叙事纠结在政治、市场、大众、知识分子等多重关系中，它们的合

① 2004 年 4 月 19 日《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指出“红色经典”是“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岁月久远的、影响最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其具体作品包括《子夜》、《家·春·秋》、《林海雪原》、《红岩》、《红日》、《红旗谱》、《小兵张嘎》、《一江春水向东流》、《三家巷》、《沙家浜》、《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在同年 5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中对“红色经典”又做出了相应解释，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

② “红色经典”改编的盛行不仅有着用怀旧故事赚取收视率和票房的商业目的，同样蕴含了主流意识形态希望以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形式实现更好地占据社会文化空间的政治诉求，因而才有对其的鼓励和扶持。市场的经济冲动与国家的政治能量在大众的文化需求之间达成了利益的平衡，但二者相互合作的关系只有在保证主流政治价值得到体现的前提下才能形成。一旦商业资本过分追求利润，违背了国家思想文化秩序建设的主导方向，甚至与主流政治价值取向相对抗，势必遭到打压和限制。

力作用构成了革命历史书写在当下光怪陆离的景象，其中折射出文学转型和时代变迁中的隐秘文化心理。相比于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当下的社会文化氛围显然要宽松许多也复杂得多。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换、市场经济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文化思潮的多元发展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型塑了革命历史再叙事的表现方式。正如革命是评述 20 世纪中国历史和政治文化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一样，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转型，也离不开对革命历史叙事的梳理与探讨。从 50—70 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到 80 年代以来书写革命历史的作品，它们构成了当代文学中革命历史书写的完整链条。另外，一些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影视剧作品的出现，进一步显示了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代的复杂状态，对它们的关注可以拓展论文研究的视域。由于 1990 年代以来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特征更为明晰^①，因此，本书以这一时期以来小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经典革命历史叙事为参照，重点探讨后革命氛围中革命历史是如何被“再叙述”和为什么会被这样书写，整体透视中国当代文学中革命历史叙事的发展脉络和叙事特征。

2. 研究现状与本书思路

学界对革命历史叙事的研究一直较为活跃，或解读单篇作品，或对某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叙事作整体描述，或联系其他文学现象来探讨革命历史叙事某一方面的特征等等，诸如此类的单篇论文层出不穷。近年来，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研究取得了方法上的重大突破和理论视野的创新，唐小兵、黄子平、李杨等学者受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

^① 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曾把 1990 年代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界标”，认为此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纳入了全球化的发展轨道中。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笔者较为认可这一观点。

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叙事学理论等的启发,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话语分析等方法,进行的革命历史小说再解读,以及蓝爱国、余岱宗、程光炜、董之林、杨厚均等学者对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特征和叙事机制的分析^①,这些相关的研究成果深化了人们对革命历史再叙事特征的认识。同时,孟悦《历史与叙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期的小说创作主潮》(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版)、丁帆、许志英《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路文彬《历史想像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等学者的著作在相关章节中,运用西方理论,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对80年代以来涉及革命历史的某些作品作了深入的分析,提供了解读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视角。

不可否认,近年来学界在革命历史叙事研究上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和方法的创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富有启发的问题。相比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研究的日趋成熟,学界对80年代以来表现革命历史的作品的研究要薄弱一些,大多停留在单篇作

^① 参见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的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杨厚均《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著作。

品和单一现象的分析与评论上。缘于有些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差异较大，较少有学者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学术梳理和整体的理论阐释，特定历史情境、文化语境的阐释和文学分析之间的有机融合等问题有待加强。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在“后革命”的视角下整合这些作品，把它们纳入同一的理论阐释框架中，如陶东风《论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一文作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给笔者很大的启发。陶东风首先说明“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历史阶段”即所谓的“后革命”时期，阐述了“后革命”除历史分期含义之外的内涵，并对“革命书写”的含义和对象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后革命时期的革命叙事“无论在价值立场还是叙事方式上，它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反思革命、修正革命、重新定义革命甚或解构革命、消费革命、戏说革命的特点”，“是一种瓦解传统革命叙事的叙事”。他还指出，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经历了三个阶段，并结合具体的作品一一分析了其特征：“第一种出现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谓‘新启蒙’时期，也可以称之为‘历史修复主义’时期，在类型上属于对革命的人性化书写，其核心是赋予革命以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维度，以便修复革命叙事而不是彻底否定革命；第二种出现在80年代后期，在类型上属于解构式书写，其特点是把人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当做革命的动力，以轮回、循环的观念代替进步、进化的概念，属于对革命的倒退式书写；第三种是在犬儒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阶段，类型上属于对革命的调侃、戏谑式书写，戏说革命是其基本特征”。论文深刻地把握了不同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对革命历史叙事的影响，准确地概括了不同阶段革命历史叙事的特征。作者高屋建瓴地勾勒出“革命历史叙事主导范式的演变轨迹”所显示的理论素养和文学史眼光都为后来者的研究作了很好的示范，也引发了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正如作者意识到的，其研究限于篇幅，相关的历史梳理和逻辑论证还显得较为粗糙，